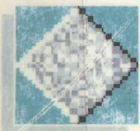


潘强恩 主编



中国乡村都市化

周大鸣 郭正林 等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潘强恩主编

中国乡村都市化

周大鸣 郭正林 等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

责任编辑：陈超英
封面设计：李雪春
责任技编：孔洁贞 黎碧霞

中国乡村都市化
周大鸣 郭正林等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50,000字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18-01826-2/G·60

定价 1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许学强：广东省高教厅厅长，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长：城市规划与经济地理，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

潘强恩：深圳万丰村党支部书记，万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专长：乡村发展理论，共有制理论。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访问教授。

专长：都市人类学，乡村社会变迁。

顾定国：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全美亚洲研究学会主席。

专长：中国族群性研究与都市人类学。

格勒：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文化研究所所长。

专长：藏文化及当代藏族社会变迁。

石奕龙：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专长：闽南文化，应用人类学。

郭正林：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讲师，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候选人。

专长：政策分析，社会调查。

李涛：四川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四川大学博士候选人。

专长：四川少数民族现状研究。

张应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讲师。

专长：南方少数民族现状，珠江三角洲研究。

马京：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人类学教研室主任。

专长：人类学理论，云南少数民族研究。

蓝达居：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讲师，博士候选人。

专长：汉族社区，经济人类学研究。

序

许学强

我是人文地理工作者，有兴趣研究城市化，包括乡村城市化问题。对人类学我并不专长，不过我有不少学术朋友是人类学家。我常常与他们共同参加学术讨论会，拜读他们的文章，甚至合作研究，得益非浅。深深感到，人类学家与地理学家探索乡村城市化虽角度不同，但有许多理论和方法是可互用的。果真如此，不仅有益于人类学和地理学学科的发展，而且使乡村城市化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更能揭示乡村城市化的本质。为此，当本书作者邀我作序时，我就抱着学习的态度欣然接受。

乡村城市化，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无论是政府决策者、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面临这个新现实，都在注视着这一社会发展的新焦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分析这一社会发展的新现实。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一位人类学家，以其独特的视野和特有的方法，研究当代中国乡村城市化的最新成果。

人类学家的视野是什么呢？是人，是人本身的生活方式。他们研究乡村城市化，就是要探讨这一新现实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的。本书以大量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乡村城市化不仅使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更便利的生存空间，更使人们抛弃落后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逐步迈向现代文明的时空，获得新的生活方式，使社会从封闭走向开

放。在我看来，人口和非农产业的集中，只是物化了的城市化。只有城市人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实现了现代化才是完全的城市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的作者正是注重于城市化过程中人的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可以说就是研究一种“文化”，而不是“物化”。任何新理论都是对新现实的理性把握。然而只有首先了解新现实的特征、表象，才能进行理论创造。本书的作者们，在中国广东、福建、云南和西藏等地，深入农村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建构理论、阐述观点。本书向读者展示了广阔的空间，在此既可看到沿海发达地区乡村都市化的辉煌，也可以体会到内地乡村都市化的躁动；既可看到汉民族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也可以发见彝族、藏族等民族对都市生活方式的追求，及其都市化的独特风格。

本书的内容中，珠江三角洲占有较大的比重。实际上，该书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主线，扩大到其它区域的。有关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研究，这么几点对我很有启发：一是有关城市化进程的划分，即从集镇化到国际化的几个阶段；二是城市化类型的划分，即都市边缘地区、村落、集镇和开发区，与珠江三角洲的实际相符；三是研究的基本点都是在最基层。该书的作者之一周大鸣先生还告诉我，他对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做了一个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专题研究，并正在整理成文。我期待着他的新作早日问世。

本书不仅是调查材料的描述，更体现了作者的理论创造。在概念上，作者力图科学地界定“乡村都市化”，提出了以“五化”特征为内容的操作定义。同时概括了乡村都市化从初级到高级的诸阶段，即表现为初级形态的村落“集镇化”(Townizing)，中级形态的“市镇化”(Citization)和高级形态的县城和小城市的“城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并

将这一过程放在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政策分析。这就体现了作者以发展的眼光、比较的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乡村都市化这一新现实，从而丰富了都市化研究的理论。

当然，作为一种理论只能以现实材料为根据，而中国的乡村都市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它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和追踪研究。因此，作者的现有的研究成果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用新的事实材料加以充实和完善。

以上是为序。

1995年3月29日

目 录

序.....	(1)
--------	-----

第一部分 乡村都市化：理论与现实

第一章 华南地区的集镇化和市镇化： 城乡融合区 (Dešakota) 与未来	(1)
一、都市研究的焦点	(1)
二、集镇化 (Townizing) 的村庄	(5)
三、“市镇化” (Citization)	(8)
四、都市化与乡村	(11)
五、中国的城乡融合区 (Desakotas)	(13)
第二章 中国的乡村都市化	(17)
一、乡村都市化问题的提出	(17)
二、乡村都市化的理论探讨	(24)
三、乡村都市化的几个个案比较	(36)
第三章 中国乡村都市化背后的政策演变	(57)
一、土地政策的调整对乡村都市化的影响	(58)
二、户籍政策的改变与农业劳动力的流动	(69)
三、产业政策的调整与乡村都市化	(75)

第二部分 实证研究

第四章 中国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都市化	(87)
一、都市边缘地区的乡村都市化	(89)
二、集镇的市镇化	(99)
三、乡村 (村、管理区) 的集镇化	(110)
四、工业区与都市化	(118)

	五、讨论·····	(122)
	六、结语·····	(137)
第五章	中国城市化的一种模式	
	——厦门市郊蔡塘村的城市化过程·····	(140)
	一、城市化概念的认识·····	(140)
	二、蔡塘村整体经济结构的变迁·····	(148)
	三、蔡塘人就业结构的变迁·····	(155)
	四、城市生活方式获得的变化·····	(161)
	五、结论·····	(168)
第六章	中国藏区乡村都市化趋势	
	——堆龙德庆县典型研究·····	(171)
	一、生产方式的变化·····	(171)
	二、生活方式的变化·····	(180)
	三、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	(189)
	四、藏区乡村都市化模式及评价·····	(193)
第七章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都市化	
	——峨山彝族自治县调查·····	(195)
	一、从峨山看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乡村都市化的现状·····	(195)
	二、少数民族政策在城镇发展中的作用·····	(202)
	三、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对都市化	
	发展过程的影响·····	(204)
	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都市化的途径·····	(205)
第八章	从村落到都市	
	——深圳万丰村的考察·····	(208)
	一、乡村都市化是农村工业化的伴生物·····	(208)
	二、都市化后乡村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212)
	三、万丰村的职业分化·····	(216)

四、都市化后的乡村生活方式·····	(220)
第三部分 都市化相关问题研究	
第九章 村落都市化与外来人口	
——厦门蔡塘村外来人口的调查·····	(225)
一、蔡塘村概况·····	(225)
二、外来人口概况·····	(227)
三、外来人口抽样调查·····	(231)
四、选择与意向·····	(239)
五、几点比较认识·····	(242)
第十章 乡村劳动力转移与都市化·····	(245)
一、劳动力输出地·····	(246)
二、梯级迁移	
——既是劳务输出地又是输入地·····	(255)
三、劳动力输入地·····	(260)
四、结论·····	(264)
第十一章 珠江三角洲乡村生活方式的变迁·····	(266)
一、珠江三角洲乡村劳动	
生活方式变迁·····	(266)
二、珠江三角洲乡村消费	
生活方式的变迁·····	(271)
三、珠江三角洲乡村闲暇生活方式·····	(276)
四、珠江三角洲乡村家庭	
生活方式变迁·····	(282)
五、结语·····	(287)
后记·····	(288)

第一章 华南地区的集镇化和市镇化： 城乡融合区(Desakota)与未来

中国 15 年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亦是都市迅速扩展和向都市化转变的过程。都市在增长，聚居在都市中的人口在增长，过着都市化生活的人口亦在增长。在一些乡村地区发生着更有意义的转变，镇和乡村的隔阂、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痕沟正在消除。

乡村的变迁包括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到 2000 年估计乡村劳动力只占 40%），人口从乡村到镇的转移，镇与都市中心的生产和交流更为密切。

一、都市研究的焦点

中国的急剧变迁令世人注目，也令世人想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看待其自身的社会和发展的。按照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一般人把都市化定义为“高楼大厦”，通常用高楼大厦的数量和混凝土建筑的多少来衡量都市化的程度高低。（一位镇的官员说城市规划的正统观点是建新建筑；人们觉得不要保留森林和草地——这种乡村的因素不能引进城市景观。）都市化亦视为卫生环境的改善（建排水阴沟、清除灰尘等，像深圳、香港和天安门广场），还有电器产品和设备的普及，以及乡村贫困的消除。正如一位广东年轻姑娘说的：“这里不久将不再是村庄，

将变成工业区。我希望工业化，这样人们会更好，有更多的工作做，也容易赚更多的钱！”

这些通俗的观点集中在一起反映了变迁的主要方面——都市化、繁荣、非农化、工业化。事实上，这些概念反映了1978年以前的现实。在1978年以前农村户口意味着低收入、干农活，与都市化生活无缘，乡村、贫穷、农民、农业与城市、富裕、工人、工业相对立。1978年以后又出现了新的分类概念——乡村都市化、乡村工业化和称为“万元户”的富裕村民等等，都影响着普遍的看法。实际上一切都有相对应的词，尤其是与旧的——如“传统”与现代相对应。我注意到一幅上海出的年历，12月的图是“现代居室”：大的房间里摆着欧式家具以及钢琴、电视、音响，一个摆着童床和网球拍的小孩居室，一位妇女正在倒牛奶。屋主人（工厂的干部）和她的儿子议论道：“这是现代的，因为很富裕。我们家还不是现代的，因为没有意大利式的地板和装饰。”等等。也许还要加上一对词：中式的/西式的。官员们和学者们也有类似的看法。一位研究者指出在青海和内蒙有许多城市户口者不能视为城市人，因为“他们的思想太封建”。另一位都市研究者是这样解释他如何将一个地区划分为乡村的：尽管这一地区的就业和生活方式已发生了都市化的转变，但是当地人仍喜爱诸如旧式雕刻家具之类“传统的”的东西。按照这种说法，年轻人更“现代化”和更“都市化”因为他们更喜爱非传统的形式。在中国大部分都市化的研究者是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因而他们的研究集中在容易观察和量化的指标上，如就业、人口和生产统计等。

中国的官方人口普查和其它的正式统计都将城市分为四个级别（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建制镇。建制镇在官方城市等级中代表最低层次，但这不能准确地反映中

国都市和乡村划分的现状。都市社会学家马戎告诉我们，镇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乡镇（一般称集镇、农村集镇）和较小的乡镇，这些亦可统称为非建制镇^①。然而，我们依据 Anthony Leeds 把都市化理解为乡村与都市之间人口、信息、服务、商品、资本和财富的流动的增加，镇与村和市比较，实质上是一种不同层次的居住生活方式。

马戎的观点是从社区研究的角度来透视的，乡镇比非县城的建制镇小然而与县城不同，后者更像小城市。他将“小城镇”分为小的乡镇和建制镇，这与他的老师费孝通一致，这种划分不仅依据规模、区域、人口和环境，而且还包括“与周围乡村社区的密切关系”^②。费先生的定义与早年乡村的定义相对，正如李景汉指出的以低人口密度、共同地域、农业为主和共同的生活方式^③。在很大程度上，像通俗的定义，费和李有关镇和乡村的社会学的定义反映了1978年以前的现实。在改革之前，城乡分别构成了社会主要的矛盾，城市居民远比农民优越，包括收入、权力、机会等方面，因而称之为“铁饭碗”。这一时期城乡的差异远甚于干部与工人的差异，而村与小镇的差异正是城乡矛盾的前沿。

马戎认为，自1978年以后小城镇——乡和建制镇与整个城市系统的联系得以发展。在富裕地区，尤其是沿海的福建和广东小城镇和村之间的差异迅速消失，云南和湖南也开始这一进程。同时县城及较大镇与城市的人口、商品、信息、资本的

① 马戎：《小城镇的发展极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地位”，载“Urbanizing China”，G. E. Guldin (ed.)，Greenwood Press：Westport，CT，1992。

② 费孝通：《小城镇四记》，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出版社（上海）1937年版。

流通日益增长。

中国 15 年以来都市化是整个社会向类城市发展的过程，其特征是变得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首先，乡村的变化是“非农化”，即村民们放弃农业但仍停留在村和农村地区。第二，“乡村”人口进入乡镇企业和从事相关的活动，导致普遍的“集镇化”；已发表了许多关于村与乡镇差异的报告。第三是“市镇化”（Citization），这是乡镇持续发展的结局。总之，整个社会都在向都市方向迈进。

调查个案

并不是整个中国具有同样的发展速度。为了收集比较这一过程的资料，笔者于 1992~1993 年组织一批中国学者在华南的村和镇进行了田野调查。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周大鸣教授为中方负责人，负责协调厦门和云南大学的调查。我们按照中国的传统研究方式对每一个点进行了短时间的调查。我参观、访问、观察了富裕地区的深圳、厦门（蛇口工业区和蔡塘村）；较富裕地区的广州黄埔（南基村）和东莞市（虎门镇和大宁管理区），福建省的晋江县（安海镇和型厝村）、惠安县（崇武镇和大垵村）；欠富裕地区的广东高要县（南岸镇和新桥镇）、四会县（罗源镇和下埠管理区），福建西部的南靖县（山城镇和溪边村），湖南郴州（嘉禾县的塘村镇），云南省的峨山县（高平乡和双江镇）以及瑞丽市（勐卯镇和等喊弄）。选点注重小城市、新卫星镇、经济开发区、县城、建制镇、乡镇和村，并分别以大城市广州、厦门和昆明为基点。我主要选择东莞，尤其是大宁管理区作为调查点。选择这里一方面是语言（我可讲广州话和普通话）的便利，另一方面是我的合作者可以帮我熟悉行政、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情况，这些是最适

合我的田野调查的。

二、集镇化 (Townizing) 的村庄

非农化是与非集体化和强调发展镇经济是同步的。一项对中国东部乡村的研究表明大约有 1/4 的村民从事非农业的工作 (女性 16%、男性 38%), 预计到下个世纪将有数千万的农民脱离农业^①。在 1991 年, 中国官方公布非农业户口的人口仅占 19.5%, 但是非农业人口中大约有 40% 的劳动力是从事非农业。显然, 尽管一部分人仍然是农业户口, 但实际上已不再从事农业。到发达地区看看就可以证实上面所说的。黄埔区的一位村民告诉我: “这里没有一个农民, 所有的土地都被开发区征购了”; 高要镇的厂长说一个人是农业或非农业户口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是个体户——虽然他们本身可能是“农业的”户口, 但为他们提供了许多的非农业的就业机会, 这一切都没改变官方的户籍身分。在相当穷的云南峨山县, 尽管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仍很低, 但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非常快 (1991~1992 年增长 37%)。

不仅人口离开了土地, 而且农用地也正在消失。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和福建沿海都可以看到满身尘土的推土机、自卸车、手扶拖拉机在填平稻田或其它农田。这些平整的土地是用于建工厂、住宅和商业目的。当地的村和村民可以得到征购费作为失去土地的补偿, 这种补偿的诱惑使得许多农民愿意保持农村户口。

^① Parish, William L., Zhe Xiaoye, Li Fan: 1994 "New Work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paper presented at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March.

这种变化大多发生在道路两旁。如在福建，我们观察到许多镇通村的道路的铺设刺激了服务业和房地产的发展。在个案中（如南靖的溪边村和安海的型厝村），镇区沿着道路扩展使村成为镇的一部分。在厦门经济特区（蔡塘村）当地村的工业区的建立发展成为工业化的群队。这种物质和功能上的整合的趋势正是改革时代行政的非集中化、对农村和都市边缘地区政府控制和政策弱化的结果。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喜欢家乡的“集镇化”。型厝村的人（官方认为距镇1公里）说他们和新搬到村周围的人构成了主要的社会隔阂。在村域内共居住着3500人，其中2000人属村民委员会，余下的属安海镇的居民委员会。这1500名所谓“非村民”，一部分是原村民“农转非”的，他们具有许多优越条件（如小孩可以进镇学校、可以进镇工作等），但他们与原村民们没有什么联系。

离镇较远的村民也发现镇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例如，一些村在服务和商品供应方面越来越自给自足，而这些原来是有赖于镇的。虎门镇周围的村民们说现在比以前少去镇里，因为过去要到镇里才有的东西现在村里就有。虽然有时需要进镇，但在村里也可能办到。即使是看电影，在1978年以前镇里仅仅有一家电影院，现在村里有电影和录相看，村里也有了长途汽车服务，或者你可以搭上摩托车直达广州。

这种流动性大巴、单车、摩托车和汽车，使得村民们有更多的时间到镇里工作、购物和玩耍。这种村的转换器成为乡村集镇化的关键。正如四会县的一名干部所说的：“村民们在城里建住房，在城里工作，但他们仍称为农民！他们要成为市民是很容易的”。

人们对于这种变迁有相当自我意识。大宁村的一位村工厂的工人谈到：“行政上我们仍被认为是农村但实际上是一个城市。之所以称为农村是因为我们这儿仍有农民”。这种通俗